

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十五”规划基金项目

胡维定 著

泰州学派的主体精神

南京出版社

PDG

序

明代中叶以后,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开始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社会经济条件的这种变化,必然会反映到思想学术领域中来。尽管当时作为封建社会官方意识形态的程朱理学仍然支撑着封建统治者的精神大厦,继续禁锢人们的思想,成为当时中国社会转型和历史进步的严重桎梏,然而,在这个斑驳陆离的转型时代,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许多道光彩纷披的明霞”,如王阳明,就是当时一位最有光辉的人物。由他所发端的道学革新运动,打破了程朱理学的陈旧格套,表现出一种追求自由的主体精神,对于当时以及后来的思想解放起了很大的作用。王阳明的“心学”尽管从本体论上来说,仍然未能跳出唯心主义的窠臼,然而,他却以冒“天下之讥”的勇气,开思想启蒙之先河,扫荡常袭故之积习,倡鞭辟近里之新学。王学的出现,是宋明理学走向衰落、趋于解体的一个标志性成果。

在王学体系内部,泰州学派——阳明姚江学派的分支,则在发扬主体精神的追求中,掀翻天地,手搏龙蛇,成为中国思想史上最早的启蒙学派。泰州学派以王艮为开山鼻祖,弟子遍及全国,影响甚广,他们出首倡道,前仆后继,经过几代人的传学布道,到明朝中期,已成为影响深广的全国性学派。鉴于泰州学派的特殊地位,其主要代表人物和学术思想受到中外学界之关注。自明末清初以来,对泰州学派的研究一直比较活跃。我国学界

史时代关系的把握,把哲学家及其系统放置到他们赖以生存的那个历史时代和文化背景中加以考察。这种研究方法有利于揭示和了解历史上主要哲学家和哲学思想的时代背景与同时态社会文化之间的横向内在联系。然而,这种方法不仅难度极大,往往不易把握,而且有可能忽视哲学思想发展的历史学渊源和总体脉络,而淡却了它自身发展的相对独立性和纵向的历史继承性。

观念史研究法。这种方法从研究者设定的哲学观点和思维框架出发,写出符合自己的哲学观念的哲学史。然而这种方法的致命缺陷就在于很难避免其结果的真实性与全面性。(以上观点可参见欧阳康著《哲学研究方法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7月版,第147~151页)。

其实,研究哲学史的方法,科学合理的研究工具与方法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这种方法,是一种科学的方法论体系,它是唯物主义、辩证法、认识论、唯物史观的统一,是研究对象、理论内容和研究方法的统一,是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演绎、抽象与具体、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群的综合应用。这种方法,应当确立哲学家的主体地位,强化哲学研究的批判意识,强化哲学研究的超越意识,强化哲学研究的个性意识、民族意识与世界意识。用这种方法研究哲学史,就可以既能科学、全面地揭示出哲学发展的历史演进轨迹,又能避免陷入对研究对象过于细枝末节的考察而忽视哲学发展总体图景的片面性;既能清晰地揭示出哲学家及其哲学思想的时代背景与同时态社会文化之间的横向联系,又能避免忽视哲学发展自身的相对独立性和历史继承性的片面性;既能写出同逻辑与历史符合的哲学史,又能避免用自己的既有观点去剪贴哲学史的片面性。

我们高兴地看到,胡维定先生的这一著作,就方法论而言,较为自觉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方法论工具,从而科学地论述了泰州学派以心斋为首,发展王学中的主体性精神的思想实质,以及他们注重平民教育、崇尚尊重人格、强调人己平等、追求主体存在价值、弘扬主体自觉、提倡主体自由、追求社会平等、实践理性社会的理论热情和实践精神,从而对泰州学派的历史地位、理论价值作出了较为客观的、恰如其分的评价。

通观全书,我们看到的不是通常那种按照本体论、认识论等一套程式性的、令人感到枯燥乏味的哲学术语的解析,也不是像一般哲学史著作那样对研究对象作简单化的唯物、唯心的定论,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则是体现作者的辩证分析、理性批判、理论创新和历史超越的科学态度,正是这一特色,使该项成果更具开拓性价值。

本书的特色其实还远不止这些。诸如该书立论正确,论证透辟,资料详实,体例独特,文字流畅,逻辑严谨,富有理论的逻辑力量,达到了较高的研究水准,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地研究泰州学派思想特色的高质量的哲学史论著。我相信,该书的出版,一定会更好地促进我国哲学界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研究,特别是推动既有地方特色又具全国意义的专门哲学史研究的深入。

在该书付梓之际,我愿向理论界广大同仁郑重推荐此书,并向该书作者、我的挚友胡维定先生致以学术上的衷心祝贺!

龚廷泰

2001年7月于金陵

自序一 认识史中某些唯心主义形态 的特定历史作用

—

可能有些朋友会问,作者为什么要从积极意义上去分析一个主要倾向于唯心主义的学术流派。本序权作为回答。

哲学作为人们世界观的理论形态,它是远离社会经济基础的。它对社会历史的作用,更多的不是那些命题、范畴的直接运用,而是通过一些中间环节,即由它们引申出来的社会思想、政治主张和各种政策才能体现出来。一般地说,在历史上起进步作用的主要是唯物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它是人类认识之树上的硕果,是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科学理论形态。它指导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指导科学研究,推动人类社会历史的前进。

但是,人类的认识是客观物质世界的复杂辩证过程的反映,它的运动发展过程类似一串圆圈,在处理认识过程中的一系列矛盾、关系的过程中,都存在着产生唯心主义的可能,认识的每一个环节、片段都可能引申出唯心主义。唯心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不是偶然的,而是由认识的曲折性所决定的必然存在。

就唯心主义体系来说,它的前提、基础无疑是错误的,但它所包含的某些环节、形态、具体派别,一旦从唯心主义的总体中剥离出来,却可以对人类认识、对社会历史起一定的促进作用,

这是不可忽视,也不应忽视的。泰州学派作为一个思想流派,其所包含的哲学思想主要倾向于唯心主义,但是该学派作为明朝中叶的最早启蒙学派,又有它的进步作用,而挖掘其积极的历史价值,正是本书写作的宗旨。

当然,就像十九世纪初期的庸俗唯物主义仅仅只能阻碍认识的发展一样,唯心主义中更多的形态是没有积极意义的,如贝克莱的主观唯心主义等等,但这并不影响对某些唯心主义形态积极作用的分析。

一般地说,唯心主义历史观在历史上曾起过进步作用,因为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所有的哲学思想在社会历史观方面基本上是唯心主义的。如果不承认唯心史观在特定历史情况下的作用,就等于说马克思主义以前的社会历史观所决定的一切社会政治思想都是消极的。这不但取消了进步阶级与反动阶级在历史观上的区别,取消了每一阶级不同发展时期的区别,而且也无法解释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前的社会发展、前进的历史。既然如此,那么一般世界观上的唯心主义的某些形态也可以在一定条件下起进步作用,因为这两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我们应该坚持哲学的党性和科学性相统一的原则,把唯心主义放在整个人类认识过程中考察,对具体的唯心主义作细致的分析并给予确当的历史地位。对待历史上的唯心主义,也应该像对待任何历史事件一样“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①。这正是本书在论述泰州学派过程中所企求贯彻的思想方法。

在人类认识之树上,唯心主义是一朵不结果实的花。这就

^① 《列宁全集》第2卷,第150页。(人民出版社版,下同。)

是说,沿着唯心主义的哲学形态不能最终通向人类认识真理的道路。但是,它能为结果实的花授粉,提供结果的条件,能使通向真理道路的唯物主义在内容上吸收养料,在形式上也能受到某些巧思的影响,从而使唯物主义克服自己原先的粗糙、不成熟。从这个意义上说,某些认识环节上的唯心主义形态确实“提供了新的东西”。因此,只要是在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的哲学形态,不管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我们都应该实事求是地对其加以分析,仔细地分析它们“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过程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它现在是怎样的”^①。哲学史是人类的认识史,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历史是复杂曲折、丰富多彩的,如果仅仅限于研究唯物主义的发生发展史,看不到某些唯心主义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作用,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态度。

二

唯心主义作为一种哲学形态,为什么某些形态、环节能作为进步的社会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从而体现出它的历史作用呢?

第一,历史上每一个阶级都有产生、兴盛和衰亡的发展阶段,不管是统治阶级还是被统治阶级,当他们处于上升时期,反映他们哲学形态的思想、方针、政策就能加快历史前进的步伐。

一般地说,在这个历史时期内,往往这个阶级的思想更多地由唯物主义占主要地位,而唯心主义则居次要地位,这是该阶级之所以能保持蓬勃向上的主要原因。但是,这并不是说只有占主要地位的唯物主义在这些阶级思想中才有促进作用;相反,由于各种特定的历史条件,有些进步政治思想和处于上升时期的

^① 《列宁全集》第4卷,第437页。

阶级的政治主张,是建立或部分建立在唯心主义基础上的。这是因为,一个进步的思想家、政治家究竟利用哪一种哲学形态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并不在于它是承认物质第一还是意识第一,而是看其能否有效地为他所代表的那个阶级的利益提供思想理论武器。当然,唯物主义形态一般比较适应进步阶级的理论需要。因此,在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的某些阶级的思想中,有些唯心主义形态所起的作用是不能忽略的。

在中国封建社会,大多数统治阶级都以儒家思想为本阶级的正统思想,他们的社会政治思想、方针、政策都可以从儒家思想中找到渊源。儒家思想是一个兼具各种哲学形态的庞杂体系,其中的唯物主义形态对社会历史发展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不少研究也予以了高度的评价,如荀子“天行有常”、“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而儒家思想中某些唯心主义形态对社会历史发展的一定进步作用就不大为人们所认识,比如孟子“仁政”思想就曾为新兴地主阶级服务过,它就是建立在唯心主义“君权神授”基础上的。孟子认为“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而“天与之”,^①但天的意志又是通过贤明的君主来实现的,暴君则要受到天的处罚。要求统治者顺从天意,施行“仁政”。他的社会政治思想充分体现了其唯心主义世界观。但是,“仁政”学说是和奴隶主的意识形态相对立的,具有民主思想因素。他要统治者爱护和关心人民的生命和生活,强调“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②,反对残害人民,反对春秋无义之战,要对“善战者服上刑”^③。他认为,一个统治者不行“仁政”就丧失了“君主”的资格,另一个统治

① 《孟子·万章》上。

② 《孟子·尽心》下。

③ 《孟子·离娄》上。

者杀掉他是完全应该的。他对统治者说：“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①他甚至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②。孟子的“仁政”思想对整个封建社会中政治思想的发展起了巨大的影响，历代封建统治阶级中的仁人志士都以孟子的“仁政”学说为治理国家的理论依据。史称“文景之治”、“太康盛世”、“贞观之治”等社会繁荣时期，都是以形成“仁政”为特征的。而一部分被压迫的进步势力，也经常借用“仁政”学说作为反抗当时统治势力的思想武器。当然，“仁政”思想的进步作用不是它作为唯心主义形态的共性，而是它作为某个唯心主义形态中所包含的民主思想因素的个性，这种个性的内容，用共性的形式表现了出来，使得大多数有成就的统治者采纳了它，从而起到历史的进步作用。整个泰州学派，尤其是本书介绍论述的主要传人，都以“王道”思想来主张“仁政”，对明中叶的统治者几乎都作了深刻的批判，体现了对古典儒学的复归。

如果说儒家思想在孟子时代由于没有被当时的统治者采纳而没有占统治地位，对当时社会历史的进步作用不明显的话，那么到了西汉鼎盛时期，董仲舒建立起适应地主阶级封建统治需要的第一个占统治地位的哲学形态，“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对促进当时的社会历史发展也是不能否定的。董仲舒所处的历史时期是西汉时期经过黄老“无为而治”得到巩固后的上升时期。我们不能设想一种为上升时期的统治阶级服务的思想对历史的发展竟不起进步作用。

董仲舒的哲学形态是神学唯心主义体系，他在论述天人关系时认为“天者万物之祖”，把天当作至高无上的神，是自然界的

① 《孟子·梁惠王》下。

② 《孟子·尽心》下。

创造者,也是地上王国的直接支配者。而且他还宣扬“王者承天意从事”,直接继承了孟子的“君权神授”思想,把神学与唯心主义结合在一起。就这点来说,显然没有什么积极意义。但是,董仲舒把“天”解释为有意志、能赏罚的上帝,认为天经常关心社会上的治乱兴衰,如果政治上有过失,天会出现“灾害”,对统治者进行“谴告”。借天之威势,对人君过分残暴加以限制,在一定程度上对统治者起了警戒的作用。特别应该予以肯定的是,董仲舒在承认天的能动性、主宰性的情况下,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性,认为人不能消极等待自然的安排。他认为“人付天数”,人的道德、品质、形体是与天同类的,人的命运是由人的行为通过对天的“感应”而决定的。这就把天的能动的主宰作用大大限制了,而把这种地位给予了人。因此,在董仲舒的“神权”背后,我们看到了对人的作用、地位的重视和强调,以及对人的力量的自我信任。这正是以汉武帝为代表的处于上升时期的地主阶级蓬勃发展的思想基础,鼓舞了地主阶级在上升时期决定自己命运的信心。

总之,作为长期以来在封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尽管主要是以唯心主义的哲学形态表现出来的,但它的某些内容对中华民族历史的进步作用是难以抹煞的。而泰州学派,尤其是创始人王艮的哲学体系则主要表现了对这种古典儒学的积极复归。

第二,在宗教势力非常强大或唯心主义世界观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情况下,唯物主义思想没有合法地位,进步势力反对反动阶级的斗争有时利用唯心主义作思想武器更为适宜。因此,社会历史的进步往往通过一种唯心主义反对或取代另一种唯心主义而表现出来。

在欧洲中世纪之初,随着大民族封建统一国家的形成,原来

奴隶制下的多神论逐渐为一神论所代替。虽然同为神创论,都是唯心主义,但一神论显然顺应民族统一的历史需要,它是社会发展的趋势在人们思想中的反映,对于多神论来说它是一个进步。以后随着封建社会的解体和资本主义的兴起,神创论又受到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天赋人权”论的批判,从强调神的作用转到强调人的作用。在这个巨变中,正是唯心主义形态的“天赋人权”论鼓舞了人们的斗志,在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化中发挥了历史的进步作用。随着资本主义的没落和腐朽,十九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又以建立在唯心主义历史观上的“情欲”学说为基础,设计了他们的理想社会制度,对“天赋人权”进行了尖锐而深刻的批判,揭露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人民被剥夺了最起码的权力,批判了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的罪恶,使空想社会主义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来源。

这种由一种形态的唯心主义反对另一种形态的唯心主义对社会历史的进步作用,在中世纪的欧洲表现得尤其明显。“当时反对封建制度的每一种斗争,都必然要披上宗教的外衣。”^①不但许多农民揭竿而起时曾经用它作为自己的旗帜,就连近代资产阶级也曾经一度皈依过它。为什么呢?恩格斯说:“中世纪只知道一种意识形态,即宗教和神学。”^②当时,神学在一切知识领域内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意识形态的一切形式——哲学、政治、法学都被纳入到神学中成为神学的科目。这就决定了中世纪的社会运动、思想斗争、政治斗争都不得不采取神学的形式,在宗教的旗帜下进行。而唯心主义在这种条件下就以宗教斗争的形式体现出进步作用。从异端思想的出现一直到大规模的宗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90页。(人民出版社版,下同。)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1页。

教改革运动,其作用都是以一种宗教反对另一种宗教的形式出现的。这种以宗教为旗帜的“反封建的革命反对派活跃于整个中世纪。革命反对派随时代条件之不同,或者是以神秘主义的形式出现,或者是以公开的异教的形式出现,或者是以武装起义的形式出现”^①。十六世纪上半叶的德国路德宗教改革运动就是这样,它直接导致了轰轰烈烈的德国农民战争,给欧洲封建势力以沉重的打击。路德宗教改革运动不是单纯的神学教义之争,而是一种政治性的、神学上的反抗。它否定教皇的威信,剥夺了教皇进行掠夺的“天国钥匙”。改革后的教义不保留教会、否定教会的权力。它废除了炼狱、否定了赎罪税,从而为资产阶级革命打下了基础。恩格斯对此以极高的评价称之为“欧洲大陆上资产阶级与封建主义的第一次大决战”。总之,以宗教为旗帜的斗争,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推动了历史的前进。其实,泰州学派对宋明理学唯心主义的批判又何尝不是用一种唯心主义来反对另一种唯心主义,从而体现了泰州学派的历史进步性的呢?在宋明思想研究中,不少人都对王艮以后的传人如颜钧、何心隐尤其是李贽等人斥为“狂禅”,对泰州学派中传道的方式带有宗教色彩而无条件地批判。其实,明中晚期对思想的禁锢是很严厉的,张居正为相就明令禁止讲学,东林党的清议也遭迫害。在这种情况下,用带有神秘的宗教色彩进行聚会讲学,只能是不得已的选择。李贽尽管皈依佛教不还是遭到捕杀?披着宗教外衣进行思想讲学正是明晚期进步思想斗争的一种形式。

第三,任何阶级不能凭空创造出一种新思想来,它只能在对现有的思想材料的批判改造中提出自己的新思想。

农民阶级在与封建制度的斗争中就是这样的。这个阶级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404页。

阶层很复杂,他们一般不代表新的生产力,没有自己的哲学形态,他们只能在对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的粗糙的运用中,在宗教神学的旗帜下集合起自己的力量,提出本阶级的纲领,向旧世界宣战。中国自秦汉以来,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统治非常严厉,镇压人民的反抗非常残酷,广大农民没有丝毫可以利用的合法权利来进行斗争。因此,利用宗教神学、披上合法的外衣能更有利于斗争。几乎每一次较大规模的农民战争都是利用宗教神学发动、组织的。从秦末陈胜、吴广利用鱼藏尺素到东汉末年张角的太平道,从宋江的“替天行道”到太平天国的拜上帝会,大多数拿起了宗教神学唯心主义的武器。随着农民战争的水平不断提高,他们对宗教的利用也越来越摆脱直观、粗糙的形式而变得较精细,甚至有严密的教规、教义、组织法等等。利用神权反对王权,不能说不是一种倒退,但正是这种形式上的倒退使农民战争迫使封建统治者的收敛成为可能。农民战争的最后结果,虽然不能创造一个新社会,总是沦为改朝换代的工具,造成又一个封建帝王家族的兴盛,但是在中国,把一代代封建王朝送入坟墓的正是这种农民战争。至于在欧洲,则几乎每一次较大规模的农民战争都是宗教斗争的直接结果。

资产阶级在与旧制度的斗争中同样不能凭空创造一种新思想。欧洲早期资产阶级代表了新的生产力,他们的革命一开始就是与农民运动结合起来的。农民既然是有神论阶级,中世纪宗教势力又十分强大,因此,从宗教中吸取现成的理论为革命鸣锣开道就成为可能和必须。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十七世纪英国的资产阶级就是“在加尔文教中给自己找到了现成的理论”^①。路德教改革的结果引起了更加激进的加尔文宗教改革,使资产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91页。

阶级革命思想发展到更高阶段。当时,加尔文教“以真正法国式的尖锐性突出了宗教改革的资产阶级性质,使教会共和化和民主化”^①。既然这种教会“是完全民主的和共和的,而在上帝的王国已经共和化了的地方,人间的王国还能够仍然从属君主、主教和领主吗?”^②这正是资产阶级推翻封建专制最需要的理论依据。以宗教形式出现的唯心主义在这里起了它的特定作用。加尔文教利用宗教的形式表达出来的这一理论依据,资产阶级不需要承担“异端”的危险,而找到一件满意的思想武器。这样,加尔文的信条便适应了当时资产阶级中最勇敢的人的要求。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就从加尔文教那里吸取了适合自己需要的理论,开始了一场人类历史新纪元的革命。作为宗教唯心主义形态的加尔文教虽然对异端的残酷镇压丝毫不比天主教逊色,加尔文甚至用慢火将研究血液循环的塞尔维烤了两个小时,表现出宗教本身的反动。但是作为它的教义所体现的民主共和思想却又正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武器,因此又体现了它的进步性。我们不能把两个方面混同一谈,用它体系上的反动性否定某些环节的进步性。

加尔文教为什么能为资产阶级革命提供理论依据?这要用当时社会状况来回答。恩格斯说:“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由此产生的社会之划分为不同的阶级,以及这些阶级彼此之间的斗争。”^③加尔文的教义中正是反映了当时资产阶级的经济发展及其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反映了当时资产阶级社会生活的内容。“他(指加尔文,笔者注)的先定学说,就是下面这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52页。

②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91页,第389页。

一事实宗教上的反映：在商业竞争的世界中，成功或失败不取决于个人的活动或才智，而取决于不受他支配的情况。起决定作用的不是个人的意志或行动，而是未知的至高的经济力量的摆布；在经济革命时期，当一切旧的商业路线和商业中心被新的所代替的时候……这种情形就特别真实了。”^① 这就是加尔文教之所以能成为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论依据的原因。

第四，除了无产阶级以外，历史上任何一个进步阶级总带有两重性，即要求革命的革命性和阻止人民蓬勃掀起革命运动的妥协性。唯心主义往往能适应这些阶级两面性的特征，为他们所利用。在他们批判旧世界时，唯心主义可以强调他们的精神力量。在他们成为又一个旧世界的维护者时，唯心主义便可成为阻止历史前进的力量。

十八至十九世纪的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成为德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导，说明了由于进步阶级的两重性这一特殊因素而利用了唯心主义作为推动历史前进动力之一。正如恩格斯指出的：“正像十八世纪的法国一样，在十九世纪的德国，哲学革命也作了政治变革的前导。”^② 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在法国革命的影响下，也希望通过革命摆脱封建束缚，把“共和国作为唯一合法的国家形式”定为“永远力求和企图实现的基础”。^③ 但另一方面，他们又面临着比英法革命前更为强大的封建势力，而且他们与封建贵族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特别是看到法国革命中人民的力量和现代工业无产阶级的兴起，因而又害怕革命，产生动摇，要求妥协，把希望寄托在封建上层的一些开明贵族的改良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9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65页。

上。所以德国资产阶级虽然也利用哲学作为自己的思想武器,但是法国革命前的唯物主义那种彻底战斗性的表现形式和理论显然不适用了。而“在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哲学中,德国庸人的面孔有时从肯定方面表现出来,有时又从否定方面表现出来”^①的这种一面要革命、一面求妥协的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就适应了资产阶级的需要,成为德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武器。从康德到弗希特、谢林以至黑格尔,他们的“每一部杰作都渗透了反抗当时整个德国社会的叛逆精神”^②。他们用理性论证资产阶级共和国,主张资产阶级民主自由,追求“完善的社会”,反映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德国资产阶级革命是不彻底的,但这毕竟是一次进步的反封建专制的民主革命,它推动了德国社会向资本主义发展,而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在这次革命中无疑起了进步的作用。

第五,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唯物论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事物,而不是从人的实践活动,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事物。他们不了解人们在认识客观世界的同时,也认识了自己;不了解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改造了主观世界;不了解主体反映客体时的能动作用,把主体仅仅看作是对客体的消极接受和直观反映,结果使唯心主义发展了能动的方面,强调了精神的作用。

在历史上,当一个进步的思想家、政治家所代表的那个阶级或政治势力还处于软弱、不成熟的时候,往往总是从精神力量上寻找自己的武器,强调精神的作用,发展自己的能动方面,来补充阶级力量或政治力量的不足。因此唯心主义正好适应了这一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8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34页。

需要。

王阳明是中国封建社会哲学主观唯心主义的集大成者,但他的“良知说”的唯心主义真理观强调了主观能动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批判了封建专制主义,极大地消解了程朱理学对人们精神的禁锢,起了一定的进步作用,成为许多进步思想家和革命家用来号召革命、发动革命、鼓舞自己的精神力量。明末东林党人顾宪成深有感慨地说:“当士人桎梏于训诂词章之间,骤而闻良知之说,一时心目俱醒,犹若拨云雾而见白日,岂不大快!”^①可见王阳明的良知说对思想启蒙和解放是起过较大影响的。

王阳明的良知说是对孟子思想的继承和发挥。孟子说:“人之所不说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由此可见其唯心主义的实质。王阳明认为,良知即是本心,亦即先验的道德意识,是生来“固有”的辨别是非善恶的能力。一切道德标准都从良知出来,“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悌”^②。认为只要用“致良知”的工夫就可以不必死记道德教条而自然合乎道德标准。他的“致良知”旨在巩固封建社会秩序,其唯心主义实质也毫无可取之处,但是作为一种哲学形态它又表现了反抗权威的倾向。他企图推倒朱熹的偶像,甚至降低了孔子的绝对权威:“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③强调以“良知”作为衡量一切事理是非的标准,而不崇拜圣贤偶像,不轻视庸常俗人。王阳明还进一步肯定良知是人类普遍具有的,因而不论是

① 《小心斋札记》卷三。

② 《王文成公全书》卷一《传习录》上。(以下简称《传习录》上)

③ 《答罗念庵书》。